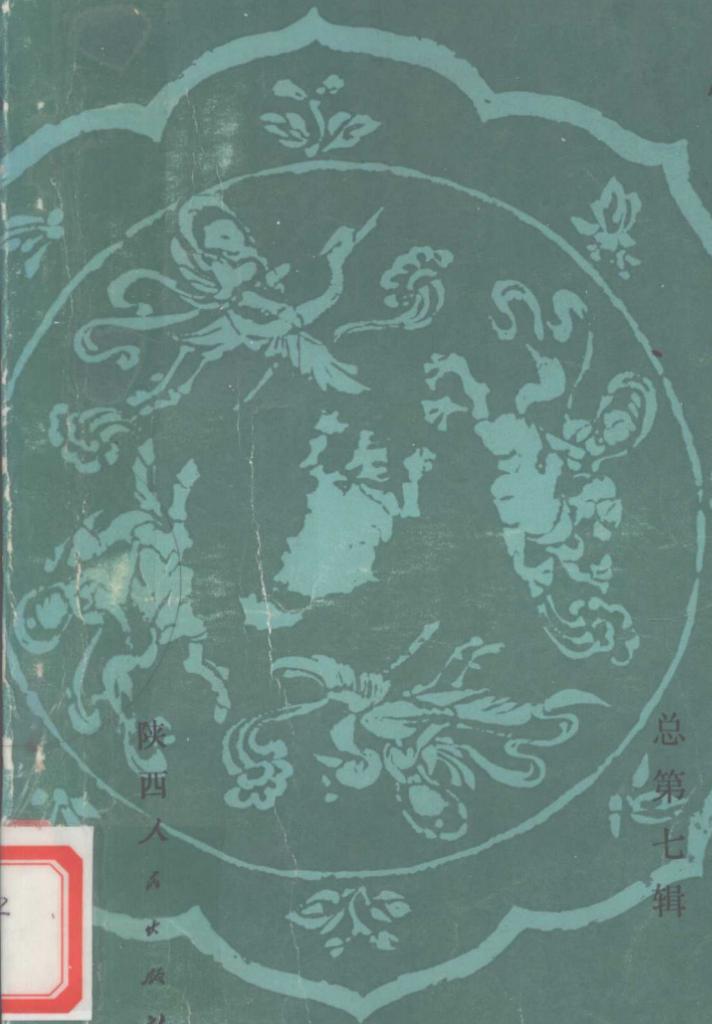


唐代文學論丛

总第七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學

论 从

总第七辑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办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学论丛

总第七辑

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编辑：唐代文学论丛编辑部（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31号）

印刷：西安新华印刷厂 发行：陕西省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印张11.5 插页1 字数250,000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700

统一书号：10094·582 定价2.35元

《唐代文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萧涤非

副主编: 程千帆 胡国瑞 霍松林 安 旗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运熙	安 旗	刘善继	胡国瑞
高海夫	萧涤非	程千帆	傅璇琮
景生泽	詹 锦	廖仲安	霍松林

目 录

· 作家作品 ·

- 论初唐诗坛 杨柳(1)
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 张锡厚(22)
山水诗的一大飞跃
——王维与谢灵运山水诗之比较 马秀娟(28)
简论李颀在唐七律诗中的地位 孙琴安(48)
杜甫的诗论与诗
——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一课
..... [日]吉川幸次郎 著
孙昌武 译(54)
试论杜甫的言家事诗 于翠玲(83)
岑参边塞诗艺术特色初探 王启兴(95)
论中晚唐的边塞诗 董乃斌(114)
论刘禹锡的散文 吴汝煜(131)
李商隐无题诗新探 蒋凡(147)
论李商隐诗对晚唐政局的反映 周建国(161)
论杜牧诗歌的艺术表现特色 王西平
张田(174)

· 问题探讨 ·

- 唐代僧人诗和唐代佛教世俗化 汤贵仁(190)
唐人绝句的意象艺术探索 张国伟(212)
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出来才开了新局面 罗宗强(237)

“不平”则鸣说探本 周启成 (256)

• 生平考证 •

关于“三十二余罢”与“四十九仍入”

——考骆宾王生年兼与骆祥发商榷 任国绪 (263)

润州诗派考 向以鲜 (277)

李白身世的一个问题 杨 镰 (294)

白居易《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诗考释.....

..... 朱金城 (298)

• 校勘诠释 •

高适诗注商榷 刘 乾 (303)

关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的

“剑器浑脱”问题 李国瑜 (326)

读李白诗文记疑(二则) 安陆县考证李白办公室 (336)

“衡霍”、“庐霍”释义质疑 刘友竹 (339)

• 文献资料 •

李康成《玉台后集》辑目 陈尚君 (344)

一套重要的唐代文献索引

——评日本平冈武夫先生主编的《唐代研究入门》

..... 李 庆 (351)

• 知识掌故 •

《阳关曲》漫谈 易接道 (357)
甘久生

论初唐诗坛

杨柳

(一)

在唐诗研究领域，初唐是个薄弱环节。长期以来人们对初唐诗坛重视不够，评价偏低，有份量的专著、论文不多。解放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论述初唐诗坛也存在同样缺点，未能反映初唐文坛真实风貌。甚至象唐太宗那样重要的“雄才自当驱走一世”（胡应麟），“文武间出，首辟吟源”（胡震亨）、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初唐诗坛先驱者和奠基人以及王梵志那样杰出的通俗诗派开创人也无片言只语论及。郑振铎先生于1932年出版的“一家之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设专节论述王梵志诗，兼及寒山、拾得、丰干。他写到初唐诗人多达三十余人，其中象陈叔达、杜之松、蔡允恭等是为人们所忽视的，并给予“一时并作，诗坛的情况是颇为热闹的”（页279）较客观评价。可惜后来的文学史编写者没有吸收郑氏这方面成功的经验，过份渲染六朝绮靡的笼罩，浮艳诗风的泛滥，使人读后感到初唐诗坛一片荒凉寥落，和史家笔下描述的“贞观之治”经济上的高度繁荣“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以及文化上的空前发展“诗笔草隶，卓越前古”（《旧唐书·太宗纪上》的情形，很不协调，相应！

由此又必然产生另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众所周知，文艺的样式、体裁、形式的发展，有源有流，有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也有继承和革新的辩证关系，初唐诗坛既如此寥落不堪，那紧接着唐诗的高度繁荣局面，即为人歆羡不置、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或“盛唐之音”又是怎样突然形成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从唐玄宗至代宗持续半个世纪唐诗全盛景象的出现是和初唐近一个世纪来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大批有才华卓识的诗人在创作理论上的积极探索和艺术实践上的不断创新分不开的。

今日有诗篇传世的初唐诗人多达三百余人。唐太宗李世民和他周围一群由隋入唐的文人学士如虞世南、欧阳询、李百药、许敬宗、褚亮、杨师道等随着新王朝的建立，在诗歌领域面临着如何解决承先与启后、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李世民远在贞观初对监修国史房玄龄的谈话中就严肃地批评了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文体浮华，无益劝诫”，提出“词理切直”，“裨于政理”的要求。日后对著作佐郎邓隆的谈话中又尖锐地批判了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徒有“词藻”，“文集”，乱政害物，“宗社皆须臾倾覆”（《贞观政要·文史》）。《帝京篇序》是李世民关于诗创作理论上具有纲领性的文字，在这篇近三百字的序中，他首先总结、评论了历代帝王行事得失，对“轩昊舜禹之上”，持肯定赞许态度；对“秦皇、周穆、汉武、魏明”的穷奢极欲，暴征横敛，则给予猛烈抨击。接着抒写自己的怀抱：“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最后明确提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

的诗歌创作原则。

完整地理解李世民上述意见，可归结成两点精神实质：第一，打起复古的旗帜，推行革新的主张。试看他对周、秦、汉、魏、梁、陈、隋历朝，抨击、批判不遗余力，就不难理解他“古为今用”的深刻微婉用心。至于标举“尧舜之风”“咸英之曲”，只是为了冲破陈陈相因的传统势力的羁绊和阻挠，使文坛革新运动较顺利地开展起来的一种高明的号召，打起的幌子。易言之，即借远古“哲人”的幽灵，实践当代创新理论的一种策略而已。初唐的四杰、陈子昂，盛唐的李白，中唐的元、白革新诗风以至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推引古文运动莫不是采取这种以复古相号召的策略！第二，他对汉赋、六朝诗风的批判主要着重于内容，而非体裁形式。他较重视作品的社会功能，强调“有益劝诫”，“裨于政理”。他并不反对艺术形式方面批判地继承与吸收。他曾运用赋的形式写《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内容追思王业维艰，功臣佐命之力。这也可算一种“旧瓶装新酒”。就今日流传李世民八十六题九十八首诗看：大部分气象恢宏，乐观奋扬，反映出李唐帝国创建初期励精图治的蓬勃生机，是他自己诗歌革新理论的实践，《帝京篇十首》是李世民的代表作，在这组讴歌京城的组诗中，诗人以雄豪恣肆的笔墨，绚丽多姿的色彩，对长安宏伟的形势，壮丽的建筑群，五彩缤纷的自然景物和富貴豪华的宫廷生活，着意渲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其一）。举一斑可窥全豹，难怪胡应麟击节赞赏，评以“藻赡精华，最为杰作。……无论大略，即雄才自当驱走一世”（《诗薮·内编》）。另一诗评家胡震亨则

引李世民“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过旧宅》），“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题河中府逍遥楼》）两联，认为与汉高祖“风起云扬之歌，同其雄盼”（《唐音癸签·品汇一》）。他们指出李世民创作风格的雄浑豪迈特点是正确的，但远未能概括李世民诗丰富多采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特征。李世民有不少描述各地巡幸畋猎生活的作品，如《幸武功庆善宫》、《入潼关》、《出猎》、《冬狩》等；还有数量可观的触景抒情、即事咏怀之作，如《辽城望月》、《还陕述怀》、《望终南山》等；更有部分题赐大臣诗篇，如《赐萧瑀》、《赐房玄龄》、《赐魏征诗》等，都很有特色。但最好的作品还数那些描述戎马倥偬生活和浴血战斗场面的篇什，如《经破薛举战地》中数联云：“移烽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疹静，再举鲸鲵灭。”何等慷慨激昂，气吞斗牛！给日后边塞诗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李世民也有部分诗流于縟章绘句，小巧弄笔，主要是那些以“赋……”、“咏……”为题的作品，未能摆脱六朝脂粉余习。这一方面说明李世民后期处尊养优、歌舞升平的宫廷生活消磨了他早年奋发搏击的锐气，另一方面也指陈出艺术的革新远较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缓慢而长期。这其实也是初唐大多数诗人面对的矛盾。特别是大批由隋入唐的文臣学士，梁、陈浮靡诗风的影响更深，词彩繁艳，“绮错婉媚”的“上官体”的出现初唐诗坛，即其例证。但这绝不能用来证明初唐诗人没有在除旧更新方面迈出步伐。史载唐太宗尝作宫体诗，要虞世南赓和，虞世南以其“体非雅正”，婉言谢绝，并乘机规谏：“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虚心接受（《新唐书·虞世南传》）。

这件事是很典型的，充分说明初唐君臣在改革六朝浮艳诗风、树立新诗风方面的努力。诗论家评虞世南诗“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故其诗洗濯浮夸，兴寄独远”（《唐音癸签·评汇一》）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指出他以改革六朝浮艳诗风为艺术实践宗旨一点却是事实。现存虞世南三十余首诗中，除部分应制诗外，不少以戎马军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五古《拟饮马长城窟》、《结客少年场》、《从军行二首》、《出塞》等写得慷慨傲岸，一洗六朝脂粉。小诗《咏萤》、《蝉》咏物托意，弦外有音，清新可喜。另有一首《应诏嘲司花女》：“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欲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用素描手法，将一个持花少女纯朴天真性格写出来了，形象鲜明，风致嫣然，语言平易，音节悦耳。体例虽是应诏，却不同于寻常写艳。从押韵（八庚韵）、平仄等格律衡量，已是一首成熟的今体七绝了。

和虞世南同时的李百药传世作品二十六首，那些奉命应制、歌功颂德之作固平淡乏味，无甚可取。但另外几首咏物小诗《咏蝉》、《咏萤火示情人》却颇有情致。《郢城怀古》对战国时秦兵灭楚、焚屠夷陵史迹致慨，写景、叙事、议论、抒情、咏史，兼而有之。鼓荡激昂，一气呵成，全诗十八韵，押入声“屋韵”到底，除首联外，余均偶对工切，实开唐人五言排律端绪。史称唐太宗首唱《帝京篇》，李百药曾奉命“并作”，深获太宗赞赏：“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旧唐书·李百药传》）可惜“并作”篇什亡轶，但由《郢城怀古》之艺术成就，概可想见唐太宗对他之推许恐非溢美。

他如王珪的《咏菊》、李义府的《咏鸟》、孔绍安的《咏

石榴》、李师道的《咏砚》都能蕴藉含蓄，“义主文外”，写物中见寄托，和“兴寄都绝”的齐、梁间诗有所异趣。魏征除乐章外，存诗仅四首，却风格遒劲，无复浮靡气息，特别是那首《述怀》自抒胸臆，慷慨激昂，感人肺腑：“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已俨然逼近盛唐气象！

综上所述，可知唐王朝创建初期，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也逐步发生变化，诗坛的革新就是具体表现。当然，由于这批诗人生活于旧朝较久，陈、隋浮艳诗风在他们身上影响较深，挣脱不易，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代表人物和不朽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们只是唐诗革新中的先驱和探索者，不可能成为主流和中坚力量。

(二)

为革新初唐诗风作出过更大贡献的当推王梵志、王绩以及稍后的陈子昂。此外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和沈、宋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努力，也取得不同程度成就。王梵志生平无考，《太平广记》卷81引“史遗”谓其养父王德祖为隋文帝时人，则大体可推定为隋末唐初人。唐皎然《诗式·跌宕格二品·骇俗》曾引其诗，继郭璞之后而置卢照邻、贺知章之前，也可旁证上述推论之可靠。从唐人著作《诗式》、《法苑珠林》及宋人陈岩肖《庚溪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笔记中如《扪虱新话》（陈善）《云卧记谈》（晓莹）、《续墨客挥犀》（高安彭乘）、《梁溪漫志》（费衮）、《林间录》（慧洪）以及黄山谷等都引过王梵志诗一点看，可知他在唐、宋之际影响颇大。他的诗尽洗陈、

隋浮艳绮靡风习，出以淡言淡语，近似口语，通俗易懂，内容却寓讽世之意，兼有禅理，实开创唐诗一个崭新流派，日后寒山、拾得、丰干直接继承这个诗派；而顾况、杜荀鹤、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流派的影响。请看下引几首王梵志诗：

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
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
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俳门如鼠穴，也须留一个。
若还都塞了，好处却穿破。

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熔铸了深刻的处世生活哲理。特别是那首《道情诗》：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以禅理诗形式抒发愤世嫉俗的感情，长歌当哭，可谓饱含血泪之作。

王梵志也写过七言诗，内容同样富于生活哲理，语言同样具有通俗风趣特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就今日已发现的王梵志诗看，咏兄弟、父子相处关系的篇章特别多，诸如“兄弟须和

顺”、“兄弟相怜爱”、“兄弟宝难得”等以及诗中反复强调对“爷娘”、“父母”、“尊人”的孝道就可窥见诗人是有为而作的。如结合初唐宫廷围绕争夺皇帝宝座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以至演变为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同胞兄弟残杀的骇人听闻史实探索，那这些诗的针对性和讽刺意味不是一目了然吗？日后陆龟蒙《泰伯庙》诗“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显然是受到王梵志诗的启发而以更明朗而辛辣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重要流派开创人的诗篇，难道不应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吗？

和王梵志大体同时的王绩也在初唐诗坛独树一帜。他的田园景物诗和咏史、咏怀诗，淡逸清新，含味隽永，完全摆脱六朝绮靡风尚的影响，在诗歌发展史上，实为上继阮、陶，下开王、孟的代表人物，王绩诗写到酒的特别多，浅言淡语中不时流露出郁勃不平之气，如《醉后》：“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过酒家五首》之一：“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运用反语抒发了类似屈原在《渔父》中抒发过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愤世嫉俗的感情。王绩的《古意六首》运用比、兴手法，咏物托志，义归雅正，开张九龄、陈子昂《感遇》诗的先声。《游仙四首》、《过汉故城》这类游仙、咏史怀古诗虽不是他首创的题材领域，但无论意境构思或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所发展，从而对唐代盛行的游仙、咏史怀古诗发生过影响。

继王梵志、王绩之后，初唐“四杰”崛起文坛，他们继续遵循唐太宗首倡的打起复古旗号，推行革新主张的策略，在理论上不断批判长期形成的文坛颓风。例如王勃就指斥六朝文坛

为“微言既绝，斯文不振”、“沈、谢争隽”，“徐、庾并驰”（《上吏部裴侍郎》）。杨炯也批判当时文坛“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卢照邻指责汉、魏以后文坛陈陈相因，缺乏创造性和新意，“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乐府杂诗序》），并以“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同上），挽狂澜于既倒的革新派自许。骆宾王也明确提出“诗人五际，比兴存乎国风”，“体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用恢复“风”、“雅”的富于号召力的口号，进行诗风之革新。他在《伤祝阿王明府序》中说：“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则百忧交轸。”《萤火赋序》中说：“事沿情而动兴，理因物而多怀。”《秋日钱陆道士陈文林得风字诗序》中云：“登高切送归之情，临水感逝川之叹。”这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谈到“驭文”、“谋篇”时提出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见是一致的，提倡抒写真情实感，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四杰这些意见，无疑都是针对六朝雕琢空洞的形式主义倾向和浮艳风习而发的。

“四杰”诗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约略统计，骆宾王百余首，王勃、卢照邻各九十来首，杨炯四十余首，合起来不过三百数十首。但从内容到形式的确有所革新，忠实地实践了他们自己鼓吹的理论主张。骆宾王“擅长什之誉”（《遯叟》），他的《帝京篇》通过长安繁华景象的描写，暴露官僚贵族的腐朽生活，极富现实意义，当时就被称为“绝唱”（《旧唐书·文苑上》本传）。他如《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特别是那篇长达百韵的《畴昔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王勃的《采莲曲》、《临高

台》等都是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作品，这种歌行融合了六朝乐府诗循环往复的句子结构形式和正在形成中的今体诗的某些格律，五、七言长短句错杂间出，形式活泼，语言流走，抒情叙事，声情并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稍后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及盛、中的李、杜、高、岑、元、白的长篇歌行，都是同源异流，一线贯注。它和破偶为奇的古诗，并行不废，成为有唐一代与今体诗分庭抗礼的重要体裁而流传后代。

值得注意的是骆宾王数度投笔从戎，通过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了大量以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从军行》、《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多次蒲类津》、《在军中赠先还知己》、《早秋出塞》、《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边庭落日》等，成为初唐诗人笔下最富特色的作品。在这些诗中，既有作者“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的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抒发，也有“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的流光消逝，事业无成的感叹，还有“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徒”（《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的故乡京国之思，这些复杂的思想感情，交融揉合一起，放在“绝壁千重险，连山四望高”（《从军中行路难》）“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的边塞险峻苍凉的典型环境中来表现，就显得特别雄浑悲壮，深沉感人，开辟了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先声，对日后王昌龄、李颀、高适、岑参等人创作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直到晚年追随徐敬业扬州起兵，还写下《在军登城楼》：“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慷慨激昂，意气飞扬。可与著名的《讨武曌檄文》相表里。笔者以为把骆宾

王奉为唐代边塞诗的开山祖也不为过。

卢照邻的歌行《长安古意》、《行路难》，五律《刘生》、《雨雪曲》等，王勃的七言短歌《滕王阁》、五律《别薛华》、《杜少府之任蜀州》、《深湾夜宿》以及其他不少羁旅思乡、临别赠友之作，杨炯的五律《从军行》、《出塞》、《战城南》以及《送临津房少府》、《送丰城王少府》、《送郑州周司功》等诗，都“气骨翩翩，意象老境”（王世贞），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初唐诗坛的革新气象。

“文章四友”中除杜审言沉沦下僚外，李峤、苏味道、崔融政治上均位跻通显，猥琐狭隘的宫廷生活圈子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扼杀了他们创作才华的发挥。苏、崔诗篇流传下来并不多，各十六、七首而已，苏味道除五律《正月十五夜》描写京城长安元宵节万家灯火、满街仕女狂歌酣舞的繁华景象和风俗淋漓尽致，为人称道外，余无可观。但他的一些咏物、应制诗用典贴切，对仗工致，对今体律诗的形成还是起过作用的。崔融诗较苏味道清新淡逸，如贬谪途中创作的《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吴中好风景》、《和宋之问寒食题黄梅临江驿》等以及另一部分边塞诗如《西征行军遇风》、《塞垣行》、《从军行》等写景生动，抒情真挚，颇能打动读者心弦。

李峤诗流传下来的多达二百余首，在四人中数量最多。其中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和小巧弄笔的咏物诗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舞文弄墨，点缀升平之作，枯燥乏味，艺术上无甚可取。另外有一部分赠别友人诗，风格清新，语言平易，感情深切恳挚，倒从笔端流露出他的真正才华。如《送李邕》：“落日荒郊外，风景正凄凄。离人席上起，征马路边嘶。别酒倾壶赠，行书掩泪题。殷勤御沟水，从此各东西。”《饯骆四》：“平